

Beni-Suef University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l-Alsun



جامعة بني سويف
مجلة كلية الآلسن

冰心与纪伯伦启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 ——以二者“问题小说”为例

Mahmoud Asaad Mahmoud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China
3331574681@qq.com

Volume 4 - Issue 1
June 2024

Print ISSN2805-2633

Online ISSN2805-2641

الفكر التنويري عند بينغ شين وجبران خليل جبران "رواية المشكلات" نموذجاً

المستخلص: تعد الكاتبة الصينية بينغ شين (1900-1999) أحد أهم الكُتاب في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الحديث، لُقبت بـ "ابنة حركة الرابع من مايو". كتبت بينغ شين -عقب اندلاع ثورة الرابع من مايو لعام 1919- العديد من روايات المشكلات مثل: (الرجل الخارق)،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وطن)، (عائلتان) إلخ، عكست خلالها مساوئ النظام الإقطاعي والصراع بين قادة الجيش، وما جلبته تلك الصراعات من معاناة لعموم الشعب الصيني. ويعد جبران خليل جبران (1883-1931) أحد أشهر أدباء القرن العشرين، وأحد رواد الأدب العربي الحديث، ومن كبار من كتبوا باللغة الإنجليزية من الأدباء العرب، وقامت شين -عام 1931- بترجمة كتابه (النبي) من اللغة الإنجليزية إلى الصينية. كتب جبران العديد من "روايات المشكلات" مثل (خليل الكافر)، (مرتا البانية)، (مضجع العروس) إلخ، نقد خلالها ديكتاتورية الحكم العثماني ووحشية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غربي. رُغم أن كلا الكاتبين ينحدران من خلفيات ثقافية متباينة، لكن تشابهت ظروف كليهما في التأثير بحركة النهضة الأدبية التي شهدتها الساحة الأدبية لكلا البلدين في مطلع القرن العشرين، كذلك اصطبغت أعمالهم الأدبية بمبادئ الديانة المسيحية وتعاليمها. وقد أثمر ذلك تكوين رؤيتهم الفنية وانتاجهم الأدبي، وخاصة "رواية المشكلات".

تستند هذه الدراسة على الإنتاج الأدبي من "رواية المشكلات" لكلا من بينغ شين وجبران خليل جبران، وتناقش من خلالها مدى تأثير تعاليم الديانة المسيحية والافكار التنويرية للنهضة الأدبية على كلا الكاتبين، ورصد أوجه التشابه وأوجه الاختلاف بينهما.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بينغ شين - جبران خليل جبران - الفكر التنويري - رواية المشكلات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ing Xin and Gibran's Enlightenment Thought ——the "Problem Novel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Bing Xin (Xie Wan Ying, 1900-1999), an outstanding writ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known as the "birth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he wrote many "problem novels" such as "Superman", "Two Families", "Back to the Country", etc., which exposed the suffering brought by warlord warfare and feudal society. Gibran (1883-1931) w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writer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one of the best English writers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Bing Xin translated his book "The Prophet" written in English into Chinese. Gibran wrote many "problem novels" such as "The Traitor Khalil", "Marta Bania", etc. He sharply criticized Western colonialism and the Ottoman Empire. Although Bing Xin and Gibran are from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two authors have many similarities and comparability, they expose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in feudal society. This thesis adopts the parallel comparison research method, and is based on the "problem novels" of Bing Xin and Gibran., it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culture, and social "enlightenment" in "problem nove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ir novels in the ideas, Gibran and Bing Xin two astronomers thought,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on the similarities.

Keywords: Bing Xin – Gibran – Christian Culture – Enlightenment Movement – Problem Novels

冰心与纪伯伦启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

——以二者“问题小说”为例

摘要:

冰心(原名谢婉莹, 1900年—1999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杰出的作家, 她被称为“五四运动的产儿”。“五四”运动爆发时, 冰心登上了文学舞台, 她积极投入了爱国学生运动。她在“五四”运动的启迪下, 写了许多“问题小说”如:《超人》《两个家庭》《去国》等, 其中揭露军阀混战和封建社会所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引起知识分子的注目。纪伯伦(1883年—1931年)是20世纪杰出的文学家之一, 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 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英语作家之一, 冰心曾将他用英语写的《先知》一书翻成汉语。纪伯伦写了许多“问题小说”如:《叛教徒哈利勒》《痴癫的约翰》《玛尔塔·巴妮亚》《新婚的床》等, 其中对西方的侵略与奥斯曼帝国的独裁统治进行了尖锐批判, 激发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改造社会生活, 因此发动了所谓的“阿拉伯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冰心与纪伯伦出身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但他们思想都带上了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和重振的启蒙精神。两位作家笔下的“问题小说”都具有很多相似性和可比性, 二者通过“问题小说”揭露封建社会中的压迫、男女爱情的悲剧、妇女的悲惨命运等社会一系列问题。本论文主要以冰心与纪伯伦德“问题小说”为依据,

通过采取对比分析和归纳总结的方法，从基督教文化和中阿社会“启蒙运动”为切入点，摹绘出两位作家“问题小说”创作思想，深入探讨与论述二者启蒙文学思想溯源异同点。

关键词：冰心，纪伯伦，基督教文化，启蒙运动，问题小说

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在主观选定的条件下随意构筑自己的思想，他思想的产生多半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即使作家的自我表现，也能追溯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这是因为首先他脱离不了赖以生存的既定的生活圈子、时代环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强大影响，离不开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与阿拉伯社会各自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与转型，中阿长期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处于停滞、落后状态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渗透蚕食政策。面对这样的情况，中阿作家借小说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进行尖锐的批评和反抗，同时力图以笔为剑，唤醒愚昧、落后的人民起来进行改革。从而，两国文坛上，“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小说成了小说创作界中主流，这派小说的创作具有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主要关心社会现实问题，这也间接带动了“问题小说”的大量创作。所谓“问题小说”是这场启蒙运动的产物，它推进了小说向更广的现实社会靠近，以很高的社会真实性提出社会和人生问题，对充满各种矛盾的社会现实进行分析。正如周作人所说的“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它，求人来解决的，是问题小说”¹这一时期，中阿两国文坛上“问题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有冰心与纪伯伦，二者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以小说探索人生，其内容上各有侧重，风格各具特色。从此，本论文主要从基督教文化和社会“启蒙运动”两方面对冰心与纪伯伦文学思想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探索二者启蒙文学思想的溯源异同。

¹朱栋霖等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0.

一、 基督教文化对冰心与纪伯伦“问题小说”中启蒙观的影响

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爱”是基督教文化中一切观念的核心与总纲。基督教文化主张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实现“爱邻如己”、“爱仇敌”等人与人之间的爱。《圣经》中提到了“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²文艺复兴运动中，许多文学家试图让基督教文化所富有的人情味更接近生活、符合现实。出生在基督教气息非常浓厚的环境下的冰心与纪伯伦，他们思想都带有博爱的精神。在冰心与纪伯伦笔下的“问题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基督教文化思想以及基督形象（耶稣）对两位作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一）基督教文化对冰心“问题小说”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加快，基督教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迅速传播。除了宗教意义之外，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也有助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与文化在中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对基督教的反感大大削弱，基督教的阻力锐减，它在中国经历了一段顺利发展的时期”³基督教文化中的“博爱”、“救赎”与人有着本然的关系“基督教的爱强调的是无差别的平等的爱，而中国儒家的爱则是有选择的爱，是爱君子不爱小人，爱熟人不爱生人的等差之爱，这爱是有亲疏远近之分的”⁴因此，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就把基督教文化作为人道主义的根本，以及改造社会的思想文化的资源之一。

冰心出生于基督教气息非常浓厚的福建福州。基督徒在福州建立了几所学校、教堂和孤儿院。冰心从中学开始便一直在基督教的环境中接

² 《约翰福音》3:11.

³ 王美秀. 中国基督教史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10.

⁴ 朱丽晓、沈路等. 佛教和基督教伦理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价值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457.

受教育，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她也在位老牧师家下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冰心曾说：“1914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中学四年之中，我所得的只是英语知识，同时因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⁵ 冰心的宗教观并不同于许多基督教徒，她不注重宗教仪式，却看重基督的牺牲和救赎，看重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她曾说：“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形象是可敬的”⁶基督教文化里的圣经故事，以及所展现出的博爱、救赎等等的思想观念被少女冰心所吸收，使她形成了救赎与牺牲的精神。基督教文化里的“牺牲”与“博爱”精神，成为冰心一生坚持的信念，构成了她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因此，杨剑龙认为：“如同研究鲁迅不能不细致地研究进化论对他的影响，研究郭沫若不能不深入地探讨泛神论对他的影响一样，研究冰心也必须细致深入地考察基督教对她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中，耶稣用了自己圣灵所具备的超自然的能力，治病救人，使压迫者得以释放，穷苦者得到援助，他的宣讲与行动都在给予人们安慰和希望。耶稣的生命也从来没离开过“救赎”这一观念，他在“救赎”的道路上面对痛苦与死亡的考验，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心。耶稣主要任务是“将万民引入基督教中，这样就能够使救赎计划得以完成”⁷“直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⁸ 为了完成圣父使命，他面对了痛苦死亡，把自己的血奉献给神，耶稣自己曾说道：“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⁹ 基督教文化的这种救赎精神对冰心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她很多的“问题小说”都有着浓厚的救赎色彩，小说中刻画了不少背负人们苦难，无私地牺牲自己的人物形象，他们用博爱来改良现实社会，用牺牲自己去救赎他人。如在《最后

⁵ 乐齐、郁华编. 冰心自叙[M]. 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6:147.

⁶ 冰心. 冰心散文[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396.

⁷ 《约翰福音》16:23.

⁸ 《以弗所书》1:14.

⁹ 《约翰福音》6:51.

的安息》这篇小说里的翠儿，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子便遭到婆婆的打骂和凌虐，而出生于富裕家庭的惠姑当作了“救赎者”，她一直在帮助可怜的翠翠，每天给翠翠小女孩子带一些零食和玩具，而且帮她洗衣服、汲水，教她认字...就像基督给那些受难者带来安慰，惠姑也一直在尽自己的力量，让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感受到真挚的爱。最终翠儿竟被婆婆毒打致死。翠儿临死的时候，她脸上写满了微笑好像“接她去到极乐世界”，享受“初次安息，也就是最后的安息”¹⁰。

冰心在故事结尾给翠翠描画了一幅“理想的天国”的美好图景，让她带着暖暖的爱意离去，也为本身较为残酷的故事结局蒙上了一层带有宗教色彩的面纱“灿烂的朝阳，穿进黑暗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像要接她去到极乐世界，这便是可怜的翠儿，初次的安息，也是最后的安息”作者也通过翠儿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封建社会童养媳制度的残酷性，反映了在尚不开明的社会里，女性只能默默地承受压迫，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超人》中的男主人公何琳，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通过作者所刻画的（何琳）形象，我们能感觉到这位年轻人，经过多少忧患与痛苦才变成这样的冷如冰石，对任何人没有一点同情，甚至冷视一切。何琳一直认为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常常痛苦地说：“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反映很多年轻人在五四时期以及五四后的失望。但充满着绝望和对世界憎恨的何琳在读小孩（禄儿）给他写的信后，改变自己的世界看待，承认自己十几年里“拒绝了母亲，拒绝了宇宙和人生，拒绝了爱和怜悯”¹¹。

冰心把主人公何琳的母亲当作了“救赎者”，在母亲形象的启发下，何彬悲观的思想转变了，遂改变了其对世界的冷漠与蔑视。冰心在描绘何彬母亲的出现时写到：“一个白衣的妇女，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

¹⁰ 冰心. 冰心文集（第一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49.

¹¹ 冰心. 冰心文集（第一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83.

着前额”¹² 这与基督教文化里的“圣母”形象有一定的吻合度，充满着圣洁的光辉。

（二）基督教文化对纪伯伦“问题小说”中启蒙观的影响

纪伯伦出生于一个基督教马龙派（天主教分支）家庭，他从小跟随父母信奉基督教，受到基督教里面的许多道德真理和仁爱思想的熏陶。纪伯伦从小的时候，就便一直在基督教的环境中接受教育“19世纪末叶贝舍里这样的山村... 遍布各地的神甫给这里带来了唯一的教育，神甫选择性地教少数人怎样阅读和书写阿拉伯语，以及做基本的算数。但這些初淺的学习只出于一个目的：训练小男孩儿，以便他们熟悉《圣经》经文和仪式，辅助教士的弥撒和宗教服务”¹³

虽然纪伯伦出身在基督教早期重要的修道士的聚居地，但他的宗教观却不同于其他基督教徒，他所信奉的宗教远远超过简单的神圣体宗教，基督教中蕴含的深邃的人生哲理和“耶稣”（作为“勇猛战士”的形象）给予了他充分的养分和力量，让他觉得有责任去改造人们的现实生活。这也与他小时候的一次经历有着重大的联系“他十岁时候，从高处摔下跌伤了肩膀，人们用了绑带给他捆成了十字，而肩膀恢复的病痛期，整整持续了40天，恰好是基督在旷野中度过的时间”¹⁴ 基督教文化的“博爱”以及“耶稣”形象的叛逆精神给纪伯伦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正如纪伯伦写给玛丽·哈斯凯尔的信中所说：“除了耶稣的人格中，我的生命再也不能找到一处更好的休憩之地”¹⁵ 纪伯伦对“耶稣”形象的理解不是那种传统的软弱隐忍的受压迫者，而是一位能够冲破陈旧传统和黑暗社会，并建立新生活的勇

¹² 冰心. 冰心文集（第一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80.

¹³ [美] 哈利勒·纪伯伦. 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M]. 马征，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

¹⁴ 同上:11.

¹⁵ [美] 哈利勒·纪伯伦. 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M]. 马征，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84.

猛战士。努埃曼曾说过：“《新约》的耶稣哭泣并受着折磨。纪伯伦的耶稣则欢笑，他远离眼泪和痛苦。《新约》的耶稣用灵魂向穷人、可怜人行福礼。纪伯伦的耶稣则不知可怜，他从贫穷中看不到还有欢乐”¹⁶

《叛教徒哈利勒》中主人公哈利勒是一位正直的青年修道士。他从小是一个孤儿，给修道院放牛干活，经常看到修道士们怎么欺诈百姓，巧取豪夺榨干穷苦人的最后一滴血。主人公用耶稣的谈话，揭露修道士们对百姓和穷苦人的欺诈，同时也向人们揭示耶稣的真正教训：“人类应该成为大地上的幸福者，应该知道通往幸福之路，并在所到之处以幸福之名传播福音……我们并非作为被放逐、被蔑视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是像一无所知的孩童来到世上，以便学习生活的美妙与秘密，出于对不朽灵魂的崇拜，探索我们心灵的内涵。这才是我读过拿撒勒人耶稣的教诲时所认识到的真理”¹⁷哈利勒也曾给牧师们读了耶稣曾说的一句话“谁有两件衣服，就请把一件给没有衣服的人。谁有食物，请也照此办理”¹⁸接着问他们为何在修道院享用着财富，而农村的民众却在挨冻受饿，苦苦挣扎。《痴癫的约翰》中，主人公反抗那些虚伪的牧师们，威胁他们将会受到耶稣的惩罚：“伪君子们…‘人之子’再来之日…他会捣毁你们的修道院，把它的基石抛入山谷之中；他会用火烧掉你们的祭坛、绘画和塑像！耶稣的鲜血和圣母玛利亚那纯洁的眼泪也会使你们倒霉，会变成滚滚洪流，将你们卷入深渊之底！”¹⁹复活节的那天，看着富有的人和贫穷人的两面生活形式的约翰用手指着天空喊道：“坐在高天光圈中心的拿撒勒人耶稣啊，请你看一看吧！...耶稣啊，他们为了他们名字的荣光，建造了无数教堂和寺庙，将你贫苦信徒的躯体，赤裸裸地抛在冰冷的狭巷中...强大的耶稣啊，伸出你的手，救救我们吧！暴君们的手对我们实在太残酷了”²⁰约翰不停地接呼唤耶稣，揭露那

¹⁶ [黎] 米哈依勒·努埃曼. 纪伯伦传[M]. 程静芬,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240.

¹⁷ [黎] 纪伯伦. 叛逆的灵魂: 小说. 话剧[M]. 李唯中,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75.

¹⁸ 纪伯伦. 叛逆的灵魂: 小说. 话剧[M]. 李唯中,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78.

¹⁹ 同上:158.

²⁰ 同上:177.

些虚伪的牧师们的累累罪行，求他快来清算他们。当约翰的反抗失败时，农民们无不讥笑他的言谈话语，而耶稣也曾经一度不被他家乡的人所认可。“福音书”中记载：“一个木匠的儿子，大家不都熟知他的兄弟姐妹吗？他哪里来的智慧和异能呢？”（马太13:53-58，马可6:1-6）

以上我们不难发现，冰心与纪伯伦的“问题小说”都深深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们所信奉的宗教远远超过简单的神圣体宗教，即不注重宗教仪式，却看重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我们也能看到，两位作家“问题小说”中都带上了浓厚的基督教的色彩，渗透着基督教意识，如：他们笔下不少的“问题小说”中，都能看到基督教文化里的死亡意识（认为死亡并非生命的绝对终止，却是生命达到更高状态的途经）的痕迹，小说中把死亡描绘成生命的永恒与神圣，深深表现出基督教的救赎内涵。

虽然冰心与纪伯伦对基督教文化里的“耶稣”形象的理解不同，冰心所了解的基督耶稣是一个包含了博爱、牺牲、救赎的形象，而纪伯伦对基督耶稣形象的理解是一位能够冲破陈旧传统和黑暗社会的形象，但不难发现“耶稣”形象对两位作家启蒙思想留下的深刻影响，他们按照各自的性格思想以“耶稣”形象作为自己理想的社会启蒙者。

二、社会“启蒙运动”对冰心与纪伯伦“问题小说”中启蒙观的影响

王洪岳先生在《中国现代主义的启蒙性质研究》中曾说：“启蒙，在中文里的意思指普及新知，摆脱蒙蔽，成为新人等；在西文如英文为ENLIGHTENMENT或ILLUMINATION，意味‘使获得光明’、照亮、启发等... 启蒙就是人从混沌懵懂的被遮蔽状态走向理智和光明”²¹。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社会上出现的文学启蒙运动，对传统古文经学的批判与抨击，动摇了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打破了知识阶

²¹ 王洪岳. 中国现代主义的启蒙性质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5.

层对传统经学的迷信，开创了价值多元和思想自由的新时代，正如马克斯·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书中认为启蒙从根本上要让人摆脱神话与其中散漫的幻想，透过现代科学驱逐人对世界的恐惧并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现实生活“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²²。在这场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冰心与纪伯伦借了“问题小说”创作对封建制度的压迫、妇女的悲惨命运等社会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回应，并形成了他们各自的启蒙观。

（一）“五四”运动思潮对冰心“问题小说”中启蒙观的影响

当五四运动的思想正在萌芽期时，思想界的那些领袖人物们，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都开始大量向中国青年介绍外国进步思想和文化。随着五四民主运动声势的不断浩大，他们从启蒙思想入手，发动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要求人们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反对专制和愚昧，并将建设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五四运动的浪潮让冰心迈出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接触了社会，让一位女青年渐渐地看到封建的旧中国社会。可以说，“五四运动”改变了冰心的志向，改变了冰心的生活道路。冰心在五四运动进行到高潮之时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并从此步入文坛。她回顾五四运动时说：“五四运动…真像闪电光一样……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²³她所写的社会问题来自于身边，、她曾说过：“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²⁴

²²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21.

²³ 乐齐、郁华编. 冰心自叙[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6: 135.

²⁴ 卓如主编. 冰心全集(第6册)[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137.

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冰心采取较为平和的态度，用创作给予困扰的人们些许慰藉。她观察到了社会上存在的不少问题，如：封建家庭对青年的压迫和摧残；家庭问题（父子矛盾、夫妻矛盾）；妇女问题（封建制度婚姻、妇女解放）；军阀混战等等。因此，她借“问题小说”来提醒人们的注意。

在冰心许多的“问题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思潮的汹涌，可以看到冰心对当时的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如《斯人独憔悴》被视为冰心最有“五四”运动色彩的小说，主要写了五四时期很多家庭中的“父子矛盾”，两个爱国的青年与他们专横暴虐的父亲之间的冲突，深深地刻上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和印记，展示了中国那段时期社会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军阀混战与启蒙思想、民主思想、自由思想的强烈竞争。小说的主人公颖铭、颖石两兄弟在“五四运动”时期，像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勇敢地投入社会，在学校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但不幸的是顽固的父亲让他们立刻终止学校的一切活动，成为军阀政府的官僚。在面对强大的封建家庭与独断专制的父亲时，他们俩没有足够的勇气反抗，默默屈从父亲的命令。

冰心所塑造的父亲形象是顽固守旧的封建制度的代表，而两个儿子是刚刚出生的五四运动的代表。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下，许多代表启蒙思想的青年人无法抗战到底，出现类似的主人公颖铭、颖石两兄弟那样，内心怯懦，缺乏斗争勇气的青年人，软弱和无力地顺从，成为封建思想的牺牲品。

《去国》里的主人公英士，是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一直对祖国未来充满了希望。回国后，英士才发现了国家的所有机构都还是处于落后和腐败之中，天天上班无事可做，技正室便是他们的谈话室，便在一处闲谈，消磨光阴。过了半年后，他就下了决心回美国去。

从主人公回国之前心里对祖国未来充满着希望到他回国看到的祖国落后腐败并无力改变时的绝望。他们留学回国后，想干一番事业，但是

国家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落后，使得他们的心逐渐地变为死灰，不得不放弃自己那一番改变社会的雄心壮志。

冰心反映当时那些学有专长却报国无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内心痛苦，在面对国家封建制度的种种腐败现象时，他们的心逐渐地变为死灰的过程。冰心通过细腻的笔触，将强烈的冲突化为无声的叹息，表达着对社会的强烈关注。

（二）“阿拉伯文艺复兴”运动思潮对纪伯伦“问题小说”中启蒙观的影响

20世纪初，在西方的侵略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 1299年—1923年）的独裁统治下，阿拉伯政治家、思想家对长期停滞、落后的阿拉伯世界开始进行改革、复兴，把反殖、反帝、反封建制度作为斗争目标。他们借用小说揭露社会种种黑暗面，激发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改造社会生活，因此发动了所谓的“阿拉伯文艺复兴运动”。

“阿拉伯文艺复兴”运动强调文学与现实的联系，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与传统阿拉伯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倾向迥然相异。因此，在这场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他们对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进行了革故鼎新，这些文学流派中，“埃及现代派”与“旅美派”是当时文坛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埃及现代派”是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它主张通过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揭露当时社会封建、愚昧、落后的状况。

另外一个文学流派是“旅美派”，它融阿拉伯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于一体，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呼唤阿拉伯人民从沉睡中惊醒。1920年，“旅美派”的作家在纽约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叫做“笔会”。这文学团体的成员涉及到了纪伯伦、努埃曼、奈西卜·阿里德、威廉·卡茨菲里斯等六位作家，他们把《旅行家》杂志作为发表作品的舞台。“笔会”所主张的是“振奋起阿拉伯文学自身的新精神，拯救它，

使之跳出默默无闻和陈陈相因的窘境，成为民族生活中的有效力量”²⁵ 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在男女恋爱、妇女地位、教权势力、国民性等问题上反映了封建思想与封建社会的黑暗。

纪伯伦代表了“笔会”的思想艺术的最高的成就，他写出了一篇篇批评封建社会的小说，这与东方民族国家的解放密不可分，与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契合之处。他往往在小说中表现出对东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对封建制度和教堂制度的势力进行尖锐的批评。在纪伯伦心中，革命是争得自由的唯一道路，他一直认为在这场复兴运动大搏斗中，阿拉伯民族会通过革命取得独立。他曾说过：“我和叙利亚人一起，会为我的国家而战斗”²⁶

纵观纪伯伦“问题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当时的东方社会的种种疾病和封建制度的独裁黑暗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如：《瓦丽黛·哈尼》描写了一个敢于反抗封建社会的东方女子，她大胆冲破封建制度和陈旧束缚，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女主人公（瓦丽黛）面对黑暗社会中的父权对妇女的压迫，她并没默默地忍受这种痛苦和压迫，她“不甘心让自己的一生跪拜在黑暗世代树起的、被称为‘法律’的可怕偶像前”纪伯伦刻画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充满自信，敢于蔑视传统法律的东方女子。他借用了瓦丽黛对所隐藏着屈辱、悲凉、不幸和男子的自私的豪华的家与她爱人住的“被情感化为爱情与和谐圣殿”的简陋房舍的比较，展示客观的真相，揭露那些豪华的家里妇女的痛苦和悲惨命运。《新婚的床》主要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莱伊拉）真诚而热烈地爱着青年赛里姆，但她被迫嫁给一个她根本不喜欢的有钱人。女主人公在面对封建社会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和压迫。她用随身带着的匕首刺向爱人的胸膛，在自杀之前高声宣布：“因为这个世界被你们用你们的传统弄得太狭窄，又被你们用你们的愚昧弄得太黑暗”

²⁵ [黎] 努埃曼·纪伯伦传[M]. 程静芬,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75.

²⁶ [美] 哈利勒·纪伯伦. 哈利勒·纪伯伦: 他的生活和世界[M]. 马征,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68.

她通过杀死情人而后自杀来表达自己对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强烈反抗，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中的父权的强大、陈旧传统的束缚等等问题。

以上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还是“阿拉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封建社会制度、陈旧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冰心与纪伯伦的“问题小说”创作都充满浪漫主义情调，他们借爱情题材（男女爱情、爱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对封建制度的压迫、妇女的悲惨命运等社会一系列问题进行反抗，勇敢揭露当时的中国社会和阿拉伯社会的腐败与丑恶，倡导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形成他们各自的启蒙观。

结论：

虽然冰心与纪伯伦出身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但当我们回到冰心与纪伯伦自身，仔细考察其宗教、时代背景，笔者发现二者笔下的“问题小说”在思想上、文学创作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宗教文化上，两位作家出生于基督教气息非常浓厚的环境，受到基督教里面的许多道德真理和仁爱思想的熏陶，“耶稣”形象对两位作家“问题小说”中的启蒙思想留下的深刻影响，他们按照各自的性格思想以“耶稣”形象作为自己理想的社会启蒙者；时代背景上，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社会上均出现了文学启蒙运动。在这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两位作家从启蒙思想入手，发动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借“问题小说”对封建制度的压迫、男女爱情的悲剧、妇女的悲惨命运等社会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回应，并形成了他们各自的启蒙观，对群体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重新予以审思。

参考文献

1. 冰心. 冰心文集（第一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 乐齐、郁华编. 冰心自叙[M].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3. 冰心. 冰心散文[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4. 乐齐、郁华编. 冰心自叙[M].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5. 卓如主编. 冰心全集（第6册）[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6. 王美秀. 中国基督教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7. 朱丽晓、沈路等. 佛教和基督教伦理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价值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8. 纪伯伦. 叛逆的灵魂：小说. 话剧[M]. 李唯中, 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9. [黎] 米哈依勒·努埃曼. 纪伯伦传[M]. 程静芬, 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0. [美] 哈利勒·纪伯伦. 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M]. 马征, 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王洪岳. 中国现代主义的启蒙性质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3.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曹卫东,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